

98岁抗战老兵回忆峥嵘岁月

“不能掉队”4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

铭记历史
——父辈的抗战

文/片 褚思雨 康岩
通讯员 申术姣 济宁报道

抗日游击岁月 十六字诀的生死较量

1927年12月，高福俭出生于济宁市一区杨庄村的一个穷苦农家，家中兄弟姐妹三人，他排行最小。1945年，年仅17岁的他，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，毅然加入济宁市大队。“参军时还不满18岁，一开始就是想有着口饭吃，能活下去。”高福俭笑着回忆说。

在革命工作中，高福俭快速成长起来。在部队里，他接受了正式训练，从稍息、立正的队伍动作，到瞄准射击、手榴弹投掷等军事技能，他都铆足了劲刻苦学习，小小年纪就表现优异，“当时虽然我年纪小，但也能为抗战做点事。”

当时，日军为巩固在济宁的占领区，频繁对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。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高福俭所在的县大队在党的领导下，灵活运用游击战术，经常在夜间行

“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。我们总是晚上出击打日军，能成功要去，不可能成功也要去，就是要让日军不得安宁。”回忆起参加抗击日军的经历，98岁的微山老兵高福俭腰板笔直，声如洪钟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星月为灯、枪炮为歌的岁月。

如今，炮火纷飞的岁月虽然早已远去，他却从未忘记。每天读书，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“我离休了，但没离党，不能掉队。”对于这位自小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来说，“不能掉队”这4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。



高福俭老人(右)和儿子聊战场经历。

动。“打鬼子不光要有勇气，还要智取！”高福俭介绍，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——这十六字诀，就是咱们的制胜法宝。”由于日军的武器精良，还有大批伪军跟着，如果在开阔地带和敌人硬拼，八路军处于劣势，于是就改成白天休整，夜间出击，常常一夜奔袭四五十公里。

为躲避日军，战士们每夜都要转移到几处地方，困了就抱着枪在田埂上眯一会儿，常常是在田地里抱着枪打个盹儿，然后又转移了，“没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睡过安稳觉。”尽管如此，高福俭从未想过退缩。

1945年5月18日晚，冀鲁豫十一军分区决定拔掉喻屯伪据点。

高福俭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，要在济宁与喻屯之间的刘屯村设伏，阻击西线增援的日军。“那天晚上，麦穗沙沙响，30多个人趴在田垄里，大气不敢出，连吞咽口水都小心翼翼。”老人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紧张，“晚上9点，总攻的枪声一响，我们在外围死死咬住敌人，打得他们晕头转向，根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！”这场战斗大获全胜，共歼敌500余人，活捉日伪自卫团副团长赵文超，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，成为他抗日战争生涯中的经典记忆。

离休不离党 永不褪色的党员徽章

从懵懂少年到热血战士，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，高福俭懂得了“家国”二字的分量：“当兵不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要把日军赶出中国！”1946年春日的麦田里，当上级问他“想不想成为党员”时，高福俭没有丝毫犹豫，干脆地给出了答案：“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觉得很光荣，我当然愿意！”

此后，高福俭跟随部队一路转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所在的县大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，陆续参加淮海战役、孟良崮战役等众多重大战役，后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，右手负伤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1951年，高福俭转业到地方，

开启人生新征程。从枣庄薛城到微山民政系统，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民政工作者，他干一行爱一行。在人生的各个阶段，高福俭担负起不同的职责，始终致力于革命事业，特别是在民政领域耕耘多年。“我有干革命的积极性，做什么工作都要拔尖儿。不会我就学，不懂的我就努力弄懂。”初任民政系统，面对陌生的工作领域，高福俭迎难而上。无论是帮扶孤寡老人安享晚年，还是助力困难家庭渡过难关，他始终冲在一线，用温暖细致的服务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。

现在，每天读书看报、准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是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。“我离休了，但没离党，不能掉队！”这句话，老人念叨了一辈子，也用一辈子践行着。

在高福俭的言传身教下，子女们个个踏实本分。“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，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，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儿子高峰说，如今兄弟姐妹都已年过六旬，老父亲仍时常叮嘱他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。

“当年，我们武器简陋，物资匮乏，但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，最终赢得了胜利。”再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，高福俭感慨万千。“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容易，不忘来时路，才能走好未来的路。”

百岁抗战女兵耿相柏：

枪林弹雨中与敌人打游击

铭记历史
——老兵口述史

杜春娜 王帮栋
通讯员 顾晓羽 济南报道

我是耿相柏，出生于1920年，在1939年时成为晋察冀军区被服厂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，曾经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担任队长。

进入晋察冀军区被服厂

1937年，八路军来到河北省，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我的家乡阜平县王快村也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成立了妇女会、青年会等。我随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参加了青年会，担任青年队长，担负着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、宣传抗日的任务。在青年会里，我接触到许多革命道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萌动了找部队、参加八路军的念头。

1939年，我的嫂子进入了八路军的缝纫工厂。她去了以后给我写信，信里提到了工厂的一些情况。我就以看嫂子的名义到了部队。那时路很远，我走了三天，才到嫂子所在的工厂。到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便在一个前方部队住下了。第二天，那个前方部队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真实、全面、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，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视和平、开创未来，济南市档案馆联合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开展“老兵口述史”系列报道，寻访老兵足迹，讲好英雄故事，传承红色精神。



耿相柏老人年轻时的照片。

不让我继续跟着。他们说，敌人在“扫荡”，而我是个姑娘，没有地方安排，让我先回家，等待“扫荡”结束。但我态度坚决，不管路途有多遥远，坚持要去被服厂。他们便找了个人送我到村公所，村公所给开了个路条。我拿着这个路条，沿路有人送我去被服厂。

进入被服厂后，我成了女工队的一员。当时，像我这样来报名参军的，有十几个人，被服厂把我们编成一个班。因为此前有丰富的青年会经验，我成了新兵班的班长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晋察

冀军区被服厂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。我们班是缝纫班，平均每人每天要缝制四到五件军装。在被服厂，我们每天除了完成繁重的被服生产任务外，还要学习、出操、站岗。

我在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一直工作到1940年秋天。这年秋天，上级指派我和军区被服厂的三十名女兵一起到晋察冀军区二分区，组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。缝纫队与制鞋队、修械队、被服队、运输队一起住在平山县桑岭沟，归二分区供给部领导。我被任命为

缝纫队队长，我们的任务是全分区部队缝制军装。那时，战士们要上前方打仗，天气冷了要穿棉衣。我们在屋里缝纫衣服，战士们就在屋外唱歌给我们听。我们缝好一件，他们就赶紧穿上一件。后来，这个缝纫队发展到了七八十人，原先的三十名女兵也发展成了骨干。

在敌人“大扫荡”中打游击

1942年秋天，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“扫荡”。有一天，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，敌人马上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拉网式“扫荡”，要求我们以队为单位就地坚持隐蔽斗争。我们立即将机器和布料隐藏起来，又将身体不好的同志送到供给部收容队，然后就带领剩下的三十多人趁着夜色，离开驻地深山转移。

转移开始不久，我们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系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去找大部队。后来，我们碰见了一个战士，他也是打游击与队伍失散了。他找到领导后和我们说，人不能太多，要分散，分到老百姓家中。按照领导的指示，我和几位班长组织了六个人，在山上找了个地方。

那几天，我们不能进村向老乡借粮，只能在荒山野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。后来，我们六个人实在饿得不行，便和老百姓借了

个脸盆当锅。说是脸盆，其实是给孩子洗裤子的盆，我们用它煮倭瓜。这些倭瓜是村里老百姓种的，我们就把钱放在老百姓的地上。

斗争是残酷的，生活是艰苦的。连着两天，我们都没有吃东西。看着敌人离着远了一些，指导员孩子的干娘给我们送了一口锅和一些粮食，我们自己煮东西吃。有一天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把锅和饭都给冲跑了，我们便赶忙向半山腰跑去躲雨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暴雨和饥饿中坚持了一天。

那时候，我们找不到组织，便自己摸索着去找。一天晚上，走到一条河边，河面上有个开船的人，他和我们说了些敌人的情况，让我们过河去。我们过河以后，碰到了陡崖，有个战士掉下去了，大约深两丈，我们手边没有物件，没法拉他，就把腰带解下来，绑上石头往下放，把他拽上来了。

在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和八路军战斗部队的打击下，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的“大扫荡”。敌人离开后，我们便决定去找组织和村公所，把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沟里的队员集合起来。集合后，我带着队员们找到了分区供给部，与其他几个队胜利会合在一起。在那里，分区供给部进行了反“扫荡”总结，我们缝纫队因为没有损失一人一物，受到了表扬。